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 CGS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建新 王莉君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17 年数据, 运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 (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愿意生育 1 个孩子), 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 在第二阶段 (由愿意生育 1 个孩子到愿意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 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 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 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 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关键词: 个人因素; 不同阶段生育意愿; CGSS2017; 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794(2021)06-0058-07

DOI: 10.13778/j.cnki.11-3705/c.2021.06.007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重要议题, 生育率持续降低引发了广泛关注。为了人口和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多次调整生育政策。2011 年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3 年各省份陆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2015 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2016 年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但这些政策未扭转低迷生育趋势, 2018 年我国出生率降至 10.94‰, 创 1949 年以来新低; 总和生育率降至 1.52, 远低于 2.45 的全球平均水平^[1]; 2019 年末, 我国人口出生率为 10.48‰, 再次触底, 出生人口比 2018 年减少 58 万。

宏观层面的生育水平由微观层面众多个体的生育行为共同决定。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密切相关。尽管生育意愿不等同于生育行为, 也不一定准确预测生育行为, 但目前用来预测生育行为的最好方式依旧是先了解生育意愿^[2]。在此背景下, 研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支持体系构建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支持和重要参考, 以期促进生育意愿, 进而提高生育率, 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现实意义。

^①张毅. 人口总量增速放缓 城镇化水平继续提升[EB/OL].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1/t20200119_1723767.html, 2020-01-19.

二、文献综述

世界面临的人口问题使生育意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类^[3]:一是讨论并解释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二是研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三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探析;四是探究家庭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属于第三类。鉴于社会背景的差异,而且本文致力于推进我国生育意愿的研究,本文将文献回顾的焦点放在国内。国内学者围绕生育意愿开展的基本都是实证研究,一些研究会借用西方生育意愿理论进行推论分析和解释。西方的生育理论涵盖了三个视角: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4],实证研究中大都采用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最常用的理论是贝克尔(Becker)的生育决策理论^[5]。本文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和数据三个方面,来回顾现有的实证研究情况。

(一)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包括意愿生育数量、时间和性别三个方面^[6]。大部分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关注意愿生育数量,少数考察了意愿生育性别,仅个别研究涉及了意愿生育时间。下文除特别说明,都在意愿生育数量意义上使用生育意愿这个概念。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涉及到的因素包含个人、家庭和社会多个类别,但目前对各类因素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本文旨在系统全面考察个人类别的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现有研究零散地讨论到了包括性别、户口、婚姻状态、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现有孩子的情况、住房、收入、工作状况以及身体状况等个人因素,本文将分为三类: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

生育意愿存在人口特征差异。总的说来,性别、户口、婚姻状态、年龄、民族、现有孩子情况等人口特征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现有的众多研究结论大体一致;然而,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相对确切的看法;相比较其他因素的研究,国内鲜有关于宗教信仰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探讨。具体来看,目前的研究认为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7];相对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对各变量的反应更加敏感^[8];城市的生育意愿低于农村,农村比城镇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更加强烈^[9]。未婚群体的生育意愿低于已婚群体;年龄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就全国整体而言,汉族的生育意愿低于少数民族,但个别省份的汉族人口生育意愿高于少数民族^[10]。学者们对于教育程度与意愿生育数量的关系,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认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意愿越低,张冲等(2019)发现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妇女生育意愿显著比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高,然而教育程度为中学和大学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差异^[11]。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受教育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12],张琬翌等(2016)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都呈U形,不同的是,城市中年龄越小的女性越倾向于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而在农村则刚好相反^[7]。在已掌握的文献中,只有李峰(2017)与方大春等(2018)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居民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他们都发现信教者的生育意愿高于非信教者^[13-14]。马良等(2016)则运用CGSS2012数据研究发现,现有孩子的情况会影响到居民的再生育意愿,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15]。

经济及其相关因素被认为是影响人口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10]。经济收入是经济状况最直接的指标。对于女性群体,大多数学者认为年工资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低。但也有人认为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分布,收入较高群体的生育意愿最高^[16]。住房也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魏欣蕊(2020)回顾了住房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目前学术界集中探讨了住房价格对生育的影响,但研究范围比价狭窄,可以从住房面积和住房拥有率等方面开展更多研究^[17]。Yi et al(2008)在研究香港房价与生育率的关系时指出,青年通常会将是否拥有房子或房子面积的大小视为生育的前提条件^[18]。另一个与经济相关的因素是工作状况,相关研究认为女性劳动参与显著降低了个体生育意愿,

子女照护是女性劳动参与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19]。可以看到经济状况方面,个人收入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结论存在分歧,本文猜测这可能是现有研究对收入变量的处理方式不同、未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目前研究缺乏从微观层面验证房子面积大小和房子拥有情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会检验这两个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

学者们很少直接验证健康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而在解释年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主要从健康状况角度出发,因此本研究会构建健康状况相关的变量。

(二) 现有生育意愿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就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以实证定量研究、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主,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以及变量和数据的情况。就数据选择来看,部分数据缺乏全国代表性,而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代表的全国性数据时间比较早,最新的数据也为2015年。单个研究对生育意愿各类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散,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本人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数据内容本身的限制。

(三) 文献总结

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试图改进变量,尤其是收入变量的处理,构建三种因素的综合模型,全面审视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期望得到更准确的经济收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现有研究未将生育意愿分阶段同时分析考察,本文在这方面进行创新研究。本文选择2020年10月公开的CGSS2017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对而言,CGSS2017是最新的适合生育意愿研究的全国代表性数据。本文有别于采用同类数据的研究之处在于两点:(1)系统考虑了多种因素,在变量的处理上更为严谨;(2)选用了同类研究很少使用的方法——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2003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随机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每次覆盖我国10000多户家庭,系统而全面收集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多个层次的数据。2017年CGSS调查完成有效问卷12582份。

(二) 变量与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分为三个类别:没有生育意愿、意愿生育1个孩子、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大于或等于2个,分别赋值为0、1、2。同时生育意愿被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提升至意愿生育1个孩子;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提升至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

按照前文的总结,自变量分为三部分: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人口特征部分基本涵盖了现有文献中讨论过的所有关于此类别的变量,同时设置年龄的平方。对于健康状况,本文构建了包含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观变量包括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和是否心理健康,其中心理健康的含义指过去四周很少或从没感到心情抑郁或者沮丧,心理不健康的含义指过去经常或总是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客观变量包括体重是否过轻($BMI < 18.5$)、体重是否超重($BMI > 24.0$)。经济状况的变量包括是否高收入、是否低收入、住房面积、住房是否自有、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衡量经济状况最直接且常用的指标是收入,而我国各省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的高低不能简单以货币的绝对值来衡量比较。鉴于此,本文以2016年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将年总收入大于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定义为高收入,而年总收入小于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为低收入。住房

①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组发布CGSS2017年的家户调查数据.网址:<http://cgss.ruc.edu.cn/index.php?r=index/artabout&aid=35>。

②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2017年CGSS数据收集了调查对象2016年的总收入,参见中国学术调查数据资料库网站CGSS2017问卷<http://cnsda.ruc.edu.cn/index.php?r=projects/view&id=94525591>。

为每个家庭的重要资产，与经济状况关系密切，相关变量以住房面积和住房自有进行衡量，具体而言，住房面积是否大于或等于 100 平方米和所居房屋的产权是否自有；工作状态和工作性质也跟收入息息相关，这里将其处理为二分变量，工作状态指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工作性质指是否从事全职工作。表 1 列举了本文各变量的定义。

表 1 变量定义

类型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	0=没有生育意愿，1=1 个孩子，2=2 个或以上孩子
自变量		
人口学特征	性别	1=男；0=女
	年龄	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
	年龄平方	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的平方
	少数民族	1=是；0=否
	有宗教信仰	1=是；0=否
	拥有大专学位或以上	1=是；0=否
	城镇居民	1=是；0=否
	已婚	1=是；0=否
	已经拥有儿子	1=是；0=否
已经拥有女儿	1=是；0=否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为健康	1=是；0=否
	心理健康	1=是（过去四周很少或从没感到心情抑郁或者沮丧）； 0=否（过去经常或总是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
	体重过轻	1=是(BMI<18.5)；0=否
	体重过重	1=是(BMI>24)；0=否
经济状况	高收入	1=是（年总收入大于所在地居民人均收入的两倍）；0=否
	低收入	1=是（年总收入小于所在地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0=否
	住房面积 $\geq 100 \text{ m}^2$	1=是；0=否
	住房自有	1=是；0=否
	从事全职工作	1=是；0=否
	从事非农工作	1=是；0=否

（三）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因变量生育意愿为多分类变量，本研究使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分析和比较影响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因素。因变量有三类，其中一个类别设为参照组（即 A，本研究为“意愿生育 1 个孩子”），其他类别看作针对组（即 C，本研究为“没有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回归系数解读为“当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因变量 A 相对因变量 C 的机率会增加多少”。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意愿生育 1 个孩子”为参照项，是因为既可以检视“意愿生育 1 个孩子”和“没有生育意愿”之间的影响因素，又可以检视“意愿生育 1 个孩子”和“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之间的影响因素，这两个阶段的生育意愿所涉及的显著因素可能有所不同。

四、研究结果

（一）数据描述

表 2 展示了本研究数据中变量的状况。大部份受访者（占 80.5%）都希望可以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而没有生育意愿和只愿意生育 1 个孩子的分别占 2.1%和 17.4%。本研究在现有基础下，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期获得较全面稳健的结果。

表 2 数据描述性分析

变量		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			整体
		0	1	2+	
样本数		264	2189	10129	12582
占比 (%)		2.10	17.40	80.50	
人口特征	性别 (%)	46.21	47.28	47.17	47.17
	年龄 (岁)	45.83	45.94	52.24	51.00
	已婚 (%)	45.83	74.92	75.48	74.76
	少数民族 (%)	6.82	5.34	8.01	7.52
	有宗教信仰 (%)	11.36	6.85	11.17	10.42
	拥有大专学位或以上 (%)	34.85	27.36	17.77	19.80
	城镇居民 (%)	65.53	61.17	42.48	46.22
	已经拥有儿子 (%)	36.74	53.40	69.77	66.23
已经拥有女儿 (%)	30.68	38.24	59.53	55.22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为健康 (%)	57.95	59.84	51.79	53.32
	心理健康 (%)	59.47	69.35	61.93	63.17
	体重过轻 (%)	15.91	9.73	9.65	9.79
	体重过重 (%)	35.23	34.86	33.96	34.14
经济状况	低收入 (%)	29.55	25.03	35.19	33.31
	高收入 (%)	22.73	25.72	24.70	24.83
	住房面积 ≥ 100 m ² (%)	34.09	35.40	52.11	48.82
	住房自有 (%)	35.23	44.40	47.26	46.51
	从事全职工作 (%)	38.64	45.77	31.12	33.83
	从事非农工作 (%)	43.18	50.07	35.38	38.10

(二) 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根据表 3 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生育意愿在不同阶段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影响第二阶段生育意愿的因素明显多于第一阶段。

在生育意愿的第一阶段模型中,经济状况对居民是否具有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平方、宗教信仰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婚姻状况、是否已经拥有儿子和心理健康对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就是说相对于参照组(意愿生育 1 个孩子),有宗教信仰(人口特征)会使居民没有生育意愿的机率增加;已婚、已经拥有儿子和心理健康的居民(人口特征和健康状况),没有生育意愿的机率减少。

在生育意愿的第二阶段模型中,相对于参照组(意愿生育 1 个孩子),增加受访者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机率的因素包括年龄平方、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拥有大专学位或以上和已经拥有儿子或女儿(人口特征),以及低收入、高收入和住房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经济状况);显著减少受访者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机率的因素包括年龄、已婚和城镇居民(人口特征),以及心理健康和体重过轻(健康状况)。

表 3 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参照组为“意愿生育 1 个孩子”）

	没有生育意愿			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特征						
性别	0.0681	0.1382	0.6220	-0.0787	0.0521	0.1310
年龄	-0.0297	0.0254	0.2435	-0.0734***	0.0112	0.0000
年龄平方	0.0005**	0.0003	0.0355	0.0009***	0.0001	0.0000
已婚	-0.9141***	0.1719	0.0000	-0.3464***	0.0722	0.0000
少数民族	0.1539	0.2709	0.5700	0.2453**	0.1076	0.0226
有宗教信仰	0.4864**	0.2194	0.0266	0.3589***	0.0954	0.0002
拥有大专学位或以上	0.2273	0.1735	0.1900	0.2127***	0.0688	0.0020
城镇居民	0.0890	0.1573	0.5714	-0.4866***	0.0587	0.0000
已经拥有儿子	-0.6021***	0.1846	0.0011	0.8202***	0.0655	0.0000
已经拥有女儿	-0.3158*	0.1815	0.0819	0.9878***	0.0620	0.0000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为健康	0.0937	0.1544	0.5440	0.0381	0.0565	0.5002
心理健康	-0.4345***	0.1425	0.0023	-0.1696***	0.0557	0.0023
体重过轻	0.3300*	0.1991	0.0973	-0.1733**	0.0882	0.0496
体重过重	0.2673*	0.1486	0.0720	-0.0400	0.0540	0.4586
经济状况						
低收入	-0.0035	0.1729	0.9837	0.1834***	0.0658	0.0053
高收入	-0.0501	0.1802	0.7811	0.1857***	0.0649	0.0042
住房面积≥100 m ²	0.1123	0.1453	0.4395	0.4674***	0.0526	0.0000
住房自有	-0.2392	0.1519	0.1152	-0.0192	0.0542	0.7238
从事全职工作	-0.1991	0.3299	0.5462	-0.0907	0.1250	0.4678
从事非农工作	0.0300	0.3313	0.9278	0.0685	0.1260	0.5865
Nagelkerke R ²	0.1500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五、讨论

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且生育 1 个孩子的意愿不受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与某些理论分析一致。比如，梁宏（2018）认为对于第一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育龄妇女大多出于爱情结晶和情感寄托等非经济因素的考虑；然而，对于第二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育龄妇女可能更多考虑经济、时间和经历等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20]，也就是说不同孩次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差别。本文将根据文献综述和回归结果，对部分变量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在两个阶段中，已婚居民“没有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相对于“意愿生育 1 个孩子”）的机率都比未婚居民小。与此相关的是，在两个阶段中，年龄的系数是负数，而平方系数却是正数，可见“没有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的机率在某一岁数出现高峰。从回归公式可以知道，第一阶段的高峰出现于 28 岁左右，而第二阶段的高峰大约出现于 42 岁。也就是说 28 岁后，居民没有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变小；42 岁后，居民意愿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的机会有所下降。这两个结论相互印证了我国婚育年龄推迟的现象。文献综述里提到，现有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上升，居民生育意愿会下降，本文的结论与此并不矛盾，但是细化了年龄与居民生育意愿的关系。据此，国家可以鼓励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人群适当提早结婚，从而增加育龄人群的整体生育意愿。

就现在的情况看，生育意愿强烈的人群集中在 28~42 岁，外界的干预通常难以改变这个群体的人口特征，经济因素自然成为干预焦点。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 1 个孩子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的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一方面高收入提高了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往往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质量，养育孩子的成本更高。最终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但很多研究在推论解释的时候,往往只考虑了一方面,各执一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高,但是对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有争议。相比其他研究,本文考虑地区差异,改进了收入变量的处理,最终发现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都更愿意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似乎呈现 U 形。因此可以直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或者设置生育补贴的间接方式,提高部分居民的生育意愿。另外,本文发现住房面积大小对生育 2 个或以上孩子的意愿影响比较大,因此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改革住房制度,保障居民住房,有望提升居民生育意愿。

居民的健康状况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这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我国正在推进的一些改善居民饮食、鼓励锻炼以促进居民健康的政策和计划,也许会对提高居民生育意愿有积极作用;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也值得关注,加强精神保障建设对提高生育意愿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 任泽平,熊柴,周哲. 中国生育报告 2019[J]. 发展研究, 2019(6): 20-40.
- [2] 风笑天. 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 [J]. 社会科学, 2017(8): 59-71.
- [3] 吴帆. 生育意愿研究: 理论与实证[J]. 社会学研究, 2020(4): 218-246.
- [4] 庄渝霞. 西方生育决策研究概述——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集成[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4): 74-80.
- [5] Becker G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ies[J]. 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1960, 209.
- [6] 周福林. 生育意愿及其度量指标研究[J]. 统计教育, 2005(10): 9-11.
- [7] 张琬翌,张云堃,乔文俊. 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0 数据的实证分析[J]. 湖北农业科学, 2016(18): 4859-4683.
- [8] 周晓蒙. 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8(5): 31-40.
- [9] 姜天英,夏利宇.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NS 数据的计数膨胀模型分析[J]. 调研世界, 2019(1): 11-17.
- [10] 王记文. 很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0—2015)重复调查数据的分析[J]. 西北人口, 2018(4): 73-80, 88.
- [11] 张冲,陈玉秀,廖海亚.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5 年数据分析[J]. 人口与社会, 2019(5): 71-80.
- [12] 邓敏,陈宝璘.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J]. 人口与社会, 2020, 36(4): 94-108.
- [13] 李峰. 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 基于 CGSS2010 年数据的分析[J]. 世界宗教研究, 2017(3): 18-34.
- [14] 方大春,裴梦迪. 居民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经验研究[J]. 调研世界, 2018(9): 9-13.
- [15] 马良,方行明,雷震,等.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J]. 人口学刊, 2016(6): 17-26.
- [16] 杨柠聪. 全面二孩背景下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1): 94-105.
- [17] 魏欣蕊. 住房与生育意愿研究综述[J]. 山西农经, 2020(6): 34-35.
- [18] Yi J, Yi X. 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and Secular Fertility Decline in Hong Kong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8(3): 961-982.
- [19] 李月,成前,闫晓. 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 [J]. 人口与社会, 2020(3): 90-99.
- [20] 梁宏. 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南方人口, 2018(2): 1-14.

作者简介:

陈建新,男,1970年生,广东普宁人,200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澳门大学公共行政硕士课程主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王莉君,女,1997年生,重庆万州人,现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刘雅欣)